

新干大洋洲商代鱼镖形器探析

王 宁

(江西省博物馆 江西南昌 330008)

Among bronze wares unearthed in Dayanzhou, Xigan there are some wares named "dartlike ware" and "arrowhead" (Zhu). After analyzing their shapes, comparing to some fishing and hunting tools in neolithic age, we think it might be fishing and hunting tools as well.

Key Words: Dayanzhou Sang Dynasty Bronze Ware Fishing and Hunting Tools

内容提要 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批名为“鱼镖形器”和“镞”的器物。分析它们的形制,并与新石器时代的渔猎工具比较,细察器物的遗痕,参照相关史料等综合研究,认为它们是可用于渔猎的工具。

关键词 大洋洲 商代 青铜器 渔猎工具

中图分类号 K875.1 **文献标识码** A

《新干商代大墓》报告中,归为“鱼镖形器”^[1]和“镞”的二类器物,数量大,样式多,一些形制十分独特,发掘者将前者列为工具,后者归为兵器。本文试对它们作一番探析,阐述个人管见。

一

下面介绍要讨论的器物(详见表一):

(一)鱼镖头(“长式鱼镖形器”),5件(XDM:259~263)^[2]。通长14~11.7厘米,重49~37克。形体可分前后二段:前段锋体形近四棱锥,前聚为锋,一侧向后伸出倒刺;后段铤细且长,上有细小突节。依据体、铤形状和突节的数量可分二式:

I式(图一):4件(XDM259、260、262、263)。锋体长,截面近正方形,侧锋角较小。铤呈扁六棱状,上有四个小突节(XDM:262不明显,可能锈蚀残损);

II式(图二):1件(XDM261)。锋体短,截面近四棱形,侧锋角较大。铤呈细长条的扁四棱状,上

有六个小突节。

(二)单翼鱼镞(“短式鱼镖形器”),10件(XDM:249~258)^[3],一枚(XDM:253)铤残。通长7.2~8.4厘米,重22~28克。形如单翼镞,前收为锋,两侧刃利,一侧向后延伸成单翼。细长条的铤上有对称分布的二对小突节。依据锋角、翼的扁圆和本与翼间的角度分成二式:

I式(图三):5件(XDM251、252、254、255、257)。本平直,本翼间转角明显,翼近圆柱,后锋不明显。

II式(图四):5件(XDM249、250、253、256、258)。本略内凹,与翼弧连顺接,单翼扁平,后锋锐。

(三)圆锋无翼镞(“无翼镞 I式,长铤圆锋无翼镞”(图五),3件(XDM:264~266)^[4]。通长7.8~7.9厘米,重22~23克。截面圆形,前端膨大,渐收为锋,状如子弹头,后收束变细为颈,近关鼓突,内凹一周。铤细长,尾端尖。

表一// 新干大洋洲青铜渔猎工具数据详表

一、鱼镖头										
序号	标本号	重量	通长	锋长	正锋角	侧锋角	结节数量	式		
1	XDM259	46	14	7.5	21	14	2	I		
2	XDM260	47	12.8	6.2	28	16	4	I		
3	XDM262	49	13.5	6.9	27	14	4	I		
4	XDM263	46	13.2	6.7	25	13	4	I		
5	XDM261	37	11.7	4.1	27	26	6	II		
二、单翼鱼铍										
序号	标本号	重量	通长	铤长	锋基宽厚	正锋角	侧锋角	结节数量	式	备注
1	XDM251	22	7.4	4.3	3.2×0.8	37	15	二对	I	
2	XDM252	23	8.2	5.0	3.1×0.9	36	15	二对	I	
3	XDM254	24	8.4	4.8	3.0×0.8	35	14	二对	I	
4	XDM255	24	8.3	5.1	3.2×0.9	35	15	二对	I	
5	XDM257	22	8.0	4.5	3.1×0.9	35	16	二对	I	
6	XDM249	24	7.4	4.1	3.1×1.1	38	19	二对	II	
7	XDM250	28	7.2	3.7	3.0×1.2	35	20	二对	II	
8	XDM253	20			3.1×1.2	35	20	二对	II	铤残
9	XDM256	28	7.2	4.3	2.9×1.2	35	20	二对	II	
10	XDM258	26	7.2	3.7	3.0×1.2	35	20	二对	II	
三、圆锋无翼鱼铍										
序号	标本号	重量	通长	突节径		铤长		锋角		
1	XDM264	23	7.8	1.1		2.2		40		
2	XDM265	22	7.8	1.1		2.3		40		
3	XDM266	22	7.9	1.1		2.3		40		
四、扁菱锋无翼鱼铍										
序号	标本号	重量	通长	锋长	锋基宽厚	正锋角	侧锋角	结节数量	备注	
1	XDM268	11	7.7	2.5	1.5×0.9	30	25	4		
2	XDM269	12	7.6	2.6	1.5×0.9	31	25	4		
3	XDM270	11	7.8	2.7	1.5×0.9	31	25	4	铤断	
4	XDM271	10	7.1	2.8	1.4×0.8	30	24	4	铤尾残	

注：以上数据为笔者亲自重新称量所得。重量单位为克长度单位为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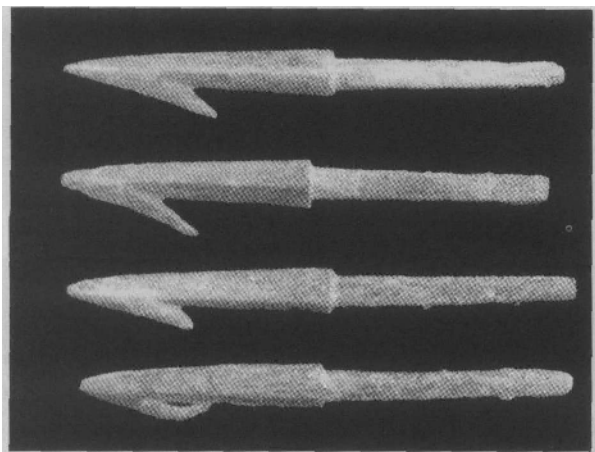
（四）扁菱锋无翼鱼铍（“无翼铍Ⅱ式，扁菱锋无翼铍”）（图六），4件（XDM：268~271）^[5]。通长7.1~7.8厘米，重10~12克。锋体扁平四棱锥，前聚成锋，无翼。细长铍上有不对称的四个突节。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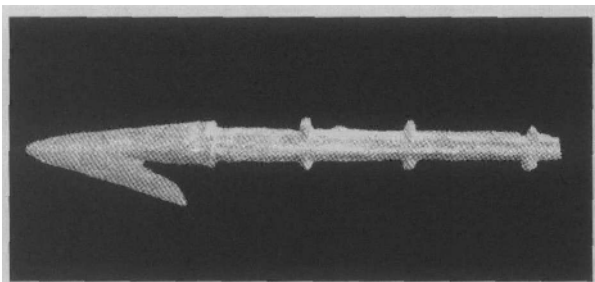
渔猎方法开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其工具是从普通的狩猎工具演变而来。当人们学会了磨制

加工骨器后不久，就能利用坚韧而又易于加工的兽骨制成带倒刺的镖头固定于细长杆前，使其成为十分有效的投掷捕鱼工具。《陔下丛考·卷二》曰：“以矢取鱼，本是古法”，射鱼在新石器时代十分流行。1981年在辽宁省海城小孤山仙人洞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里发现了已知最早的一件用鹿角制作的鱼镖头^{[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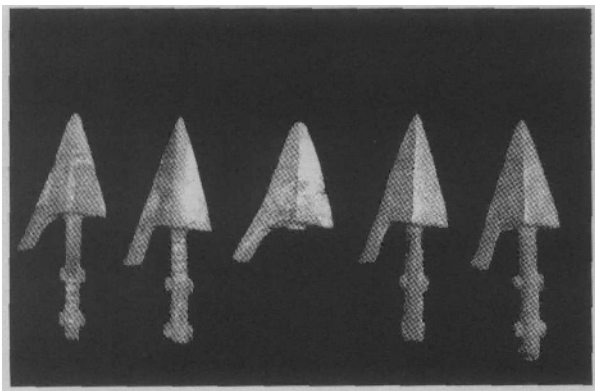
新石器时代渔猎技术更趋成熟，骨制渔猎工



图一// 青铜鱼镖头 I 式



图二// 青铜鱼镖头 II 式



图三// 青铜单翼鱼镖 I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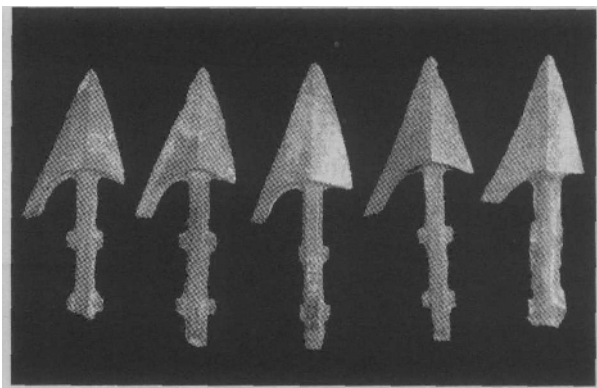
具增多 样式丰富。它们形制的共同点在于尖锋稍后伸出一个或数个倒刺,差异在铤处。宋兆麟先生将此分为三种样式^[8];

1. 有孔鱼镖头(图七:1) 铤上有一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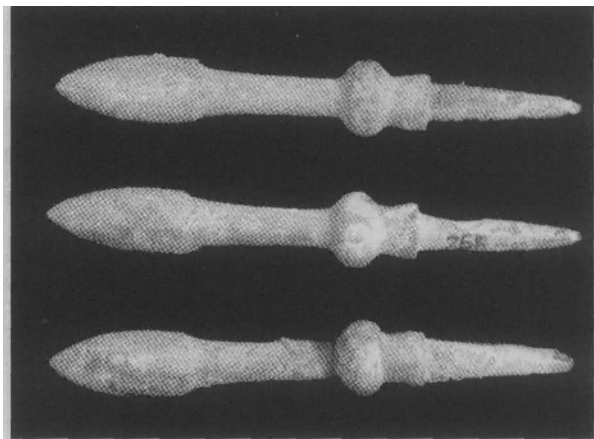
2. 有突节的鱼镖头(图七:2) 后段无孔,有一个或二个突节;

3. 有凹槽的鱼镖头(图七:3) 铤无孔和结节,本处有一圈凹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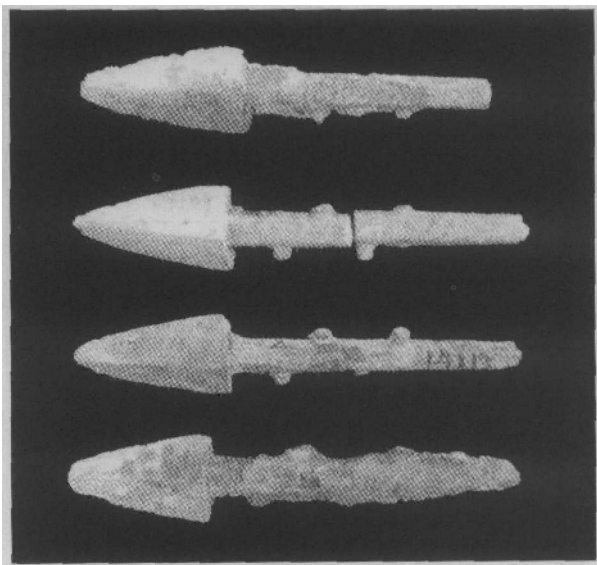
商代捕鱼方法有:1. 网捕 2. 钓鱼 3. 弓箭



图四// 青铜单翼鱼镖 II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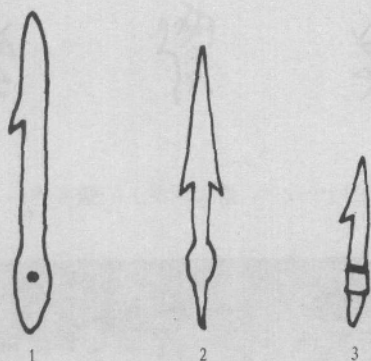


图五// 青铜圆锋无翼鱼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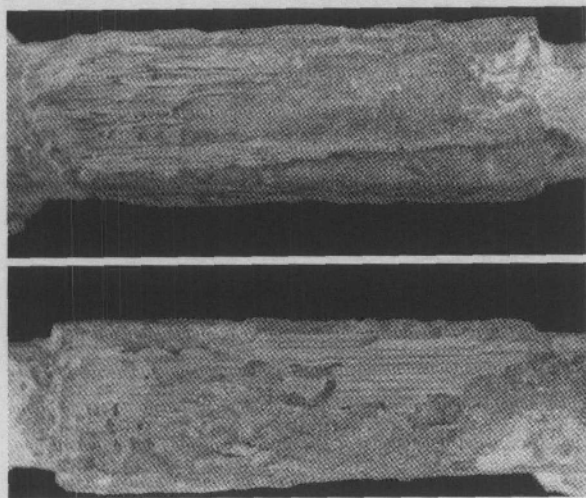


图六// 青铜扁菱锋鱼镖

射鱼 4. 筌鱼 5. 鸬鹚捕鱼^[9]。商代遗址中发现过青铜、骨、蚌质鱼钩。商代渔猎习俗仍然存在,但以前极少发现商代射鱼实物,青铜质地的制品在出



图七// 新石器时期鱼镖头的主要样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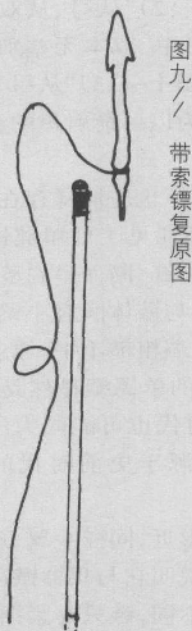


图八// A、B 青铜鱼镖头(XDM263)锋体后段特写

土遗址中还从未见过。从新干大洋洲的“长式鱼镖形器”的形制看,明显地分为体和铤二段:锋体伸出一个倒刺;铤上有细小突节,与新石器时代带有突节的鱼镖头形状相近。从形状上看,它们是从新石器时代的鱼镖头演变而来,功能相同,故称其为青铜鱼镖头比较恰当。青铜鱼镖头特别适用,锋尖铤固,易进鱼肌,牢挂难脱,效果更佳。

我们仔细观察其中一件青铜鱼镖头(XDM:263)的锋体后半,四面还有柄杆贴靠其上残存的细长纤维清晰痕迹(图八),可以看出竹质。每侧竹杆痕面边界清楚,不连续,说明一面各贴靠一细枝。据此我们可大致推测出杆体情况:先将四枝细长的竹条分别贴靠于鱼镖头锋体后段的一面,然后多枝被绑扎成一粗杆柄。

鱼镖头安装于镖杆前端的一种方式固定式,镖头牢固绑扎杆前,不能松脱。据用鹿角复制的小孤山鱼镖头作的叉鱼实验证明它“可以叉捕



图九// 带索镖复原图



图十// 青铜鱼镖复原图

体 65 厘米的大型鱼类。鱼类被叉中以后,不能带着鱼镖随意逃遁,而是以鱼镖杆上的某一点为中心作旋转运动,不需要鱼镖头和镖杆分离。因此,固定式的鱼镖是有效的叉鱼工具。”^[10]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批骨铤,发掘者“推测安装杆的方法是将铤的后端插入箭杆,可能还要加捆绑。少数铤的另一面有多道刻槽,可能是采用捆绑法安装前杆。”^[11]由于新干大洋洲青铜鱼镖头铤长且有突节,突节有利固线,因而其应采用固定式绑扎(具体方法详见下文)。青铜鱼镖头紧绑于杆前,估计杆后系有绳子,属于带索的固定式鱼镖(图九)。

三

商代北方射鱼较少,在甲骨文中仍可检索到几条用箭射鱼的记录:

“弣渔”^[12]。

“王弣鱼,其兽?”^[13]。

“戊寅……王狩大膏鱼,擒”^[14]。

“□□卜,宾,贞翌乙亥……狩鱼……”^[15]。

《说文解字》:“弣:强也;强:弓有力”,这里射鱼用强弓。“狩”字从犬从干,是一田猎用词,一般以犬追逐而以弓箭射杀猎物,所以“‘狩鱼’当时是以弓箭射鱼”^[16]。

强国铜器上的金文“彊”字三种形体也反映了西周用弓射鱼的史实。彊伯簋之彊字(图十一:1)“从弓、从自、从鱼,可隶定为彊。因自、鱼形音相近(同在鱼部)可以通用,故彊与彊相同。”彊伯自为

甌之彊字伯彊之字(图十一:2)“从弓、从双鱼,可隶定为彊,因古文字的构形单、双本无差别,故和相同”。彊伯自为甌之彊字图十一:3)“从弓、从鱼,最为多见,可隶定为彊,实为以弓箭射鱼的会意兼形声字。”^[17]

商代南方不会例外,射鱼也应同样存在,但鱼鏃罕见。李学勤先生在海外偶见 1 件单翼鏃形器物,“长 10.8 厘米,三角形前鋒,断面呈扁菱形,凸脊,一侧带长翼,向外曲出,与鏃体间有小梁,另一侧则为很短的小翼。鏃体下端粗糙不平,原应有长铤,现已断去。它和大洋洲的单翼鏃显然是同类,只是更大而精美,估计其时代也可能同大洋洲墓相近”,且推测“它可能远源于史前时代的骨鱼鏃。”^[18]

“短式鱼鏃形器”与其形近,同样一翼,形制奇特。铤上二对凸起小突节,说明它与兵器鏃以平直的铤插于箭杆前端的方式不同,鏃只要紧插杆端,杆速推鏃中矢,杀伤目的就已经达到,此时杆箭分离无关紧要。渔猎为获取游鱼,这要求鱼与鏃杆不脱。大鱼中箭难以即刻死亡,杆既能拖鱼力竭,渔人又可寻杆找鱼。铤上的突结也是便于将“短式鱼鏃形器”牢固地绑扎在杆上,与新石器时代的鱼鏃头铤上的突节的功能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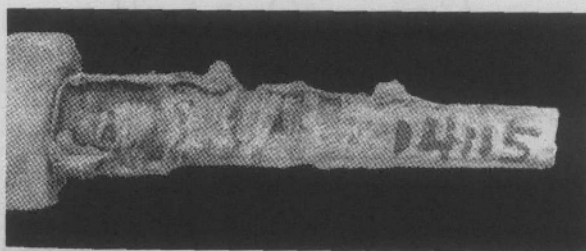
新干大洋洲的“短式鱼鏃形器”锋体形状近似于鏃,正面锋尖角度约为 40 度,体宽远远大于上述的青铜鱼鏃头,因而它要求有更大有推力才易刺入鱼肌;而其重量轻,约为青铜鱼鏃头二分之一,相配的杆相应亦细,如果抛掷,其整体的惯性小,冲击力也小;加之一侧有厚重的单翼,其容易失衡造成飞行轨迹偏离,射程不宜太远。上述因素决定了它不适宜用作抛掷叉鱼的鱼鏃头,而是必须用射力大的强弓作为发射工具,杆上或系有备回收的绳索。故“短式鱼鏃形器”应名为青铜单翼鱼鏃,其较为厚实,倒刺回挂牢靠,适合射捕大鱼。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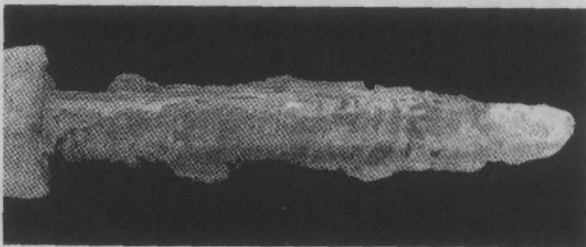
鱼鏃头安装于鏃杆前端的另一种方式是暂定式,鱼鏃头活插于杆前端,可与杆脱离。研究者认为“铤上的孔、凹槽和结节虽然与绑扎有关,但不是一般的系扎在鱼鏃木柄上,而是有独特的装置方法。此外,在上述鱼鏃的尾部,都是圆尖或者扁尖形状,而且相当短小,这一点更与绑扎无关了,当是一种活动式的插柄。”^[19]宋先生名之带索鏃(图十)^[20]。带索鏃由鏃头、手柄和绳索三部分组成。使用时抛掷鱼鏃,鏃头插入鱼肌后,虽鏃头与



图十一// 彊国铜器上的彊字构形



图十二// 青铜扁菱锋鱼鏃(XDM271)铤部特写



图十三// 青铜扁菱锋鱼鏃(XDM268)铤部特写

杆脱离,绳索仍与杆柄相连,渔者寻杆索绳得鱼。

“长铤圆锋无翼鏃”量不重,造型匀衡对称。关处膨大,表面内凹一周,与鏃的形制有差异,而与新石器带索鱼鏃头上的突节和凹槽的形制和作用基本相同,使系绳不脱,故以为其暂时置于杆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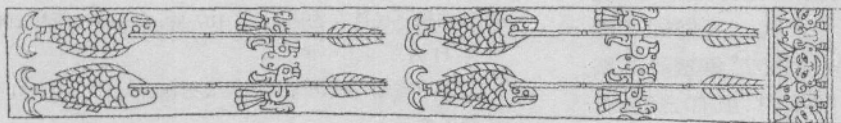
此“鏃”中鱼后,鱼挣扎摆动即会将刺入肌体的“鏃”与杆分离,依靠连于“鏃”与杆的系绳,鱼仍与杆分而不离,寻杆即能获鱼。因此“长铤圆锋无翼鏃”也应是猎鱼的“鏃”。因其轻短,不太适宜用作抛掷的鱼鏃头,也可借弓发射。据其形制、功能可名为青铜圆锋无翼鱼鏃。

五

“扁菱锋无翼鏃”锋体立面呈等腰三角形,铤上均有突节。因此它亦非兵器鏃,应为鱼鏃,可名为青铜扁菱锋鱼鏃。一件(XDM268)铤上可见细长纤维残痕(图十二),杆亦竹制。它和另一件(XDM271)的铤上还残留有缠绕的清晰线痕(图十三),看出多股细丝状的纤维聚合而成。据此判定其安装方法是先通过丝线在铤上缠绕数周,然



图十四// 汉代画像砖《弋射鱼猎图》



图十五// 三星堆出土的手杖包金图案

后再绕至杆上,牢固地将青铜鱼镞和杆束缚在一起。大洋洲的青铜鱼镖头、青铜单翼鱼镞的铤上均有突节,所以它们固定杆上方法应该相同。

扁菱锋鱼镞锋体造型对称,角度适中,约30度。且体形小,重量轻,略重于10克,与其匹配的箭杆自然细小,整体重量轻盈。因而它的发射力量不需太大,准确性较高,适用于射捕小鱼。《易经·井卦》:“井谷射鲋”。“井”,《释名》:“清也,泉之清洁者也”。李镜池注:“射鲋,射小鱼”。它说的是在清澈的水中射小鱼。

弋射是一种发射带绳箭矢的射术。“带索镖的原理运用于弓箭上就产生了弋射。”^[21]战国的一些器物上描绘了用发射带绳箭矢捕获飞禽的弋射术的图案。《列子·汤问》:“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鸽于青云之际”。《史记·楚世家》:“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因而认为“弋射用弓似较作战用弓小,史称弱弓。”“曾侯乙墓曾出土一种小木弓,制作精巧,外涂黑漆,可能就是墓主生前弋射所用之物。”^[22]

《夏礼·夏官·司弓矢》:“矰矢,茆矢,用诸弋射”。郑玄注:“结缴于矢谓之矰,矰,高也,茆矢象焉”。《淮南子·说山训》:“好弋者,先具缴与矰”。

高诱注:“缴,大纶。矰,短矢,缴所以系者”。可知矰者系绳之矢,“缴即系在矢上的绳子,可能用生丝捻成。”^[23]缠绕于二件扁菱锋鱼镞(标本XDM267、271)的细线为此提供了直观的实物(残痕)。合丝成股的细绳重量轻,韧性大,非常适用。

弋射“既可用于射雁,也可以射鱼,其目的也是利用绳索将猎物收回来。”^[24]因为猎物与射鱼二者的技术要求基本相同,用的弓矢也可同一。这也可从四川绵竹市新市乡出土的一块汉代画像砖图案(图十四)^[25]看出二者的关系,右方一棵大树上棲鸟数只,树下—人正仰身挽弓对鸟射之。左边河水一汪,前方

—船承载三人,船首一人执叉刺鱼,中间一人挽弓射之,箭不朝上,而是指向水中之鱼,船尾一人操舵。

三星堆出土的包卷手杖的金皮(标本K1:1)出土于1号坑内,上面有三组图案(图十四),靠近下端的一组为两人头。“其余两组图案相同;前端是两只相对的鸟。鸟似为猛禽,钩喙。大头,昂首,竖尾,作尾翅飞翔。鸟的后面为两条相向的鱼,头端有胡须,应为鲤鱼。鸟背上各有一枝箭,射进鱼的头部,箭尾有羽翼。”^[26]不论“金杖既是王权,又是神权,是政教合一的象征和标志”,还是“鱼、鸟图案的意义在于,鱼能潜渊,鸟能登天,它们是蜀王的通神之物。”^[27]这图案渊实是源于当时蜀地人们真实生产和生活,形象地说明了同一枝箭既可射水中之鱼,也可射天上之鸟。青铜扁菱锋鱼镞应同时具有这二种用途,发射它的当为“弱弓”。

六

先秦的青铜渔猎工具发现极少,广东潮安鲍靴子出土了一件春秋铜“镞”^[28],江苏邳海与鼻蚁钱同出过一枚铜“镞”^[29],都是带索鱼镖头。广东四会鸟旦山曾出土一批铜“镞”^[30],也属鱼镞。而

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渔猎工具时代早,数量多,式样丰,器完整,极具历史、科学价值。

渔猎是商代以前先民捕鱼的重要手段之一,到了商代,人们依赖从土地中获取粮食。商代网捞技术也完备起来,捕鱼效率大为提高。中原地区射鱼不再是获鱼的主要手段。“若射鱼于川泽,则矢费而鱼没于渊,又将何所获?”用贵重青铜制作渔猎工具,从经济上来说得不偿失。“矢鱼泽中必为习礼之义,不重取获之用,则似可断言”^[31]。

陈盘先生撰有《春秋“公矢鱼于棠”说》一文对先秦的射鱼风俗做了详尽的考证^[32],认为“渔亦为宗庙之事”。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有一段综说:“其卜渔者,曰:‘贞乎子渔之于且乙’;曰:‘十月渔’;曰:‘九月在渔’;曰:‘九月渔’;曰:‘王渔’,是亦亲渔以充祀也”。王渔为祭祀躬亲取鲜,以示敬恭祀事。甚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商代北方中原地区贵族渔猎,“与其说是生产活动,还不如说是一种娱乐,倒更为确切些。”^[33]这一习俗周代沿用未绝,曾有学者考据认为春秋北方“鱼鳖既非祭物,也远不如兽牲之重要”。“实祭中,虽有尝鱼、荐鱼,或偶获大鱼鳖也可供祭享之用,但鱼鳖非王公贵族席上之珍而常是士庶人民的祭物。”^[34]我们可以肯定商代北方地区祭祀中兽牲远比鱼类重要得多。我们认为新干大洋洲的青铜渔猎工具决非单纯的普通捕鱼用具,而是当地至尊显贵的统治者在祭祀礼仪时使用的特殊渔猎工具。这说明长江中下游南方地区商代祭祀中鱼类生物比兽牲动物地位更重要。

新干大洋洲的青铜渔猎工具和青铜器上的大量鱼形装饰^[35]已充分表明,商代长江中下游南方地区,鱼类生物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这与南方地区河道成网,湖塘连片的特殊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人们的物质生活依赖水资源的程度更大,日常生活与鱼类生物关系密切。这影响到了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民风习俗和思维方式,进而形成特有的意识、观念。大洋洲青铜渔猎工具传递出商代南方地区祭祀重鱼或重渔祭祀的重要信息。

- [7]黄慰文等《海城小孤山的骨制品和装饰品》,《人类学报》第5卷,1986年第3期。
- [8][20]宋兆麟《带索标—锋利的渔猎工具》,《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12月。
- [9][16]杨升南《商代经济史》,第328页,第33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 [10]吕遵鄂《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鱼镖头的复制和使用研究》,《考古学报》1995年第3期。
- [11]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 [12]郭沫若《粹契精编》1565,1937年。
- [13]高承祚《殷墟佚存》656,1933年。
- [14]郭沫若《甲骨文合集》10918,1978~1982年。
- [15]饶宗颐《巴黎所见甲骨录》6,1956年。
- [17]梁晓景、马三鸿《论强、矢两国的族属与太伯奔吴》,《中原文物》1998年第3期。
- [18]李学勤《四海寻珍》第7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 [19]宋兆麟《民族文物通论》第107页,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
- [21][23]宋兆麟《战国弋射图及弋射溯源》,《文物》1981年第6期。
- [22]谭白明《曾侯乙弋射用器初探—关于曾侯乙出土金属弹簧与“案座纺锤形器”的考辨》,《文物》1993年第6期。
- [24]宋兆麟《中国风俗通史·原始社会卷》,第3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
- [25]高文、王绵生编著《中国巴蜀汉代画像砖大全》图七,国际港澳出版社2002年。
- [2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60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
- [27]屈小强等编《三星堆文化》,第8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
- [28]杨豪《介绍广东近年发现的几件青铜器》,《考古》1961年第11期。
- [29]南京博物院《江苏邳海地区考古调查》,《考古》1964年第1期。
- [30]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四会山战国墓》,《考古》1972年第5期。
- [31]《春秋“公矢鱼于棠”说》傅孟真先生跋,同(32)。
- [32]陈盘《春秋“公矢鱼于棠”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本2分,1936年。
- [33]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3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 [34]杨希枚《春秋隐公射鱼于棠说驳—兼论春秋搜狩、治兵与祭牲之制》,《文史》第二十六辑,中华书局1986年5月。
- [35]王宁《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燕尾”纹探讨》,《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

[1]标有引号的器物名称来自出土报告。

[2][3][4][5]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商代大墓》,第123页、第107页、第123页、第105页。

[6]张镇洪等《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人类学报》第4卷,1985年第1期。